

沈仲章與居延漢簡在北平



附圖：沈仲章在屋外，可能是木簡存放處（一九三〇年代中期）

沈亞明

古今論衡 第 28 期 2015.12

去年七月，友人傳來〈抗日烽火中搶救居延漢簡〉一文，署名王文元。^①該文末節說：「在居延漢簡的搶救過程中，有一個人的面目始終撲朔迷離，他就是沈仲章。這個人的身世、經歷目前沒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實際上，眾多的漢簡專家也非常需要沈仲章的資料。」石汝傑在新浪博客轉載了此文，並加了按語，最後一句敦促：「希望能看到沈先生哲嗣提供更多的新資料。」^②

沈仲章（1905-1987）是我的父親。他生前對人「不說自己的事」，經傳中確實不太見到他的資料。^③但陸陸續續，父親倒給我講述過不少往事。因為父親晚婚，和我年齡相差猶如祖孫，待我懂事，他已退休，多了些空暇，被我纏住講故事。搶救居延漢簡的過程曲折驚險，富有傳奇色彩，更是我經常「點播」的「連續劇」。

八〇年代中期，復旦同窗徐維源鼓動我，請父親較系統地口述生平。^④我們每週訪錄數小時，歷時十個月，維源兄及助手又根據錄音作了筆錄。父親的一生經歷豐富，範圍很廣，梳理他的回憶是一項大工程。去年以來，我開始致力於幾個小專題，有幾篇零星短文已經或即將發表。^⑤

關於父親和居延漢簡，多年來從各種角度、以不同體裁加以介紹的報刊文章和視頻節目不少，而且常常被一再轉載。我瀏覽時，見到些大小不等的差錯。就連幾篇署名為沈仲章口述的，因父親未及校勘，也有些問題，而且尚欠「完整」，尤其是香港部分。^⑥

① 王文元，〈抗日烽火中搶救居延漢簡〉，《北京青年報》，2014.5.5。

② 石汝傑，〈[轉]沈仲章先生和居延漢簡〉，新浪博客，2014.7.29（參見網址：<http://blog.sina.com.cn/u/1889482604>，2014年7月30日造訪）。石汝傑，語言學教授，日本熊本學園大學。

③ 父親去世後，《音樂藝術》刊載了〈沈仲章生平記略〉一文，篇首題辭引用了金克木的話：「他一生好朋友，卻從來不說自己的事。」林友仁、劉立新，〈沈仲章生平記略〉，《音樂藝術》1987.2：58-62。

④ 徐維源，語言學博士，現居澳大利亞。

⑤ 沈亞明，〈1934年沈仲章隨劉半農去塞北「考查」〉，《新文學史料》2014.3：22-30；同氏著，〈許地山跟沈仲章征服香港之巔〉，《傳記文學》105.5（2014）：49-54；同氏著，〈沈仲章遺物中的傳雷相片〉，《南方都市報》，2014.11.28；同氏著，〈沈仲章與陳寅恪之緣〉，《傳記文學》106.2（2015）：56-65；同氏著，〈沈仲章與恩師劉天華〉，《中國音樂》2015.1：192-198；同氏著，〈父親沈仲章憶劉半農補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5：90-103；同氏著，〈難忘的影子：金克木與沈仲章（一）——〈忘了的名人〉中的非名人沈仲章〉，《掌故》（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一集（即將發表）。

⑥ 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綉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團結報》，1986.1.25起連載；稍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曾連載；同年又刊載於《文物天地》第4期。這幾篇都源於一份口述記錄稿。父親的那次口述大概是在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或更早，因為有封一九八三年的信札記錄，陳洪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約我暑期去北京整理該記錄稿。這個項目一拖幾年，多虧胡綉楓完成了整理，並作主發表，這段歷史才得以公諸於世。我目前手中沒有一九八三年（或更早）的霍偉記錄稿，也沒有一九八六年發表的胡綉楓整理稿。下面儘量避免重複我估計已經發表過的内容，但為敘事連貫，也許會帶到一些。本文重點介紹父親一九八五年的補充，並綜合我多次親聞，也參照少量其他資料。

我以爲，由於父親這位當事人不喜「張揚」，寫作者出些偏差情有可原，我無意也無力去逐一更正。得知有這麼多所見略同的英雄看重這段歷史，讀到他們敬重父親的言語，我對所有作者都心存感激。本擬再等一陣，安排一段時間，好好梳理這段歷史，請教專家，並查閱文獻尋求佐證，從我這位多次親聞者的角度，重新敘述整個故事。

仲夏聽得王文元和石汝傑所云，曾急急草就一篇小文，結果自己對「蜻蜓點水」不滿意，擱置一邊。晚秋又聞《古今論衡》籌劃漢簡專刊，徵集稿件。回想父親在港整理拍攝木簡，身份是中央研究院的特派員，史語所是「娘家」。既是「沾親帶故」，又是「班門」之前，豈敢怠慢？原打算花幾個月努力一下，可偏偏老家一批資料流散，爲處理這起「橫禍」，耗費了不少精力。眼見截稿期已近，只能寫到哪兒就哪兒，多少爲漢簡專刊做些貢獻。匆促之間，行文恐怕散碎，討論更不知深淺，意在提供線索，企盼指正引導，以冀後出轉精。

一、居延漢簡「逃難」之前

二〇一四年初，邢義田院士曾與我通電郵，議及了有關居延漢簡的史料。在二月二十六日的電郵中，邢先生提到：「……我們的收藏，明顯有缺，例如西北科學考察團和簡到香港後這一時期的都沒有。」

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屬下只設了一名幹事，就是沈仲章。考察團的不少事，往往就由父親這位幹事跑一圈，在各位理事中傳達意見，省去了召集會議之煩勞。凡有會議，父親也常常擔任記錄，有時列席參加，可以發表意見。作爲親歷者，父親的回憶能填補一些文獻記錄的空白。比如，一般都說在一九三五年，斯文·赫定最後一次離開中國前，順利地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帶走了一批標本。其實，這件事也有過波折，最初的拒絕函及最後的批准函都是父親起草的。其間的關節，連斯文·赫定本人也不一定都明瞭。^⑦

父親對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回憶可自成專題，下面單說考察團與居延漢簡有關的一些情況。即便冠以「與居延漢簡有關」，也將略過木簡之發現、去留之談判（父親參與此事）、考釋之分工、學者之間的矛盾等等，只談談在北平時，居延漢簡的存放、保管、照相以及相關事宜。

⑦ 這一問題將另文探討，暫不列舉參考文獻。

(一) 存放和保管

父親總說居延漢簡存放在「SONG 公府」。以前我沒問過父親這個地名的確切用字，現在參照其他資料，我想應該就是「嵩公府」（或「松公府」）。^⑧ 李向群在〈老北大校園變遷回顧〉中提到：「1930年12月蔣夢麟擔任北大校長後，將漢花園以北嵩公府的房地全部買下。起初將嵩公府的房舍修繕後，作為圖書館臨時館舍，並將圖書館從紅樓一層全部遷入嵩公府東院內，同時遷入的還有研究所國學門。」^⑨

所謂「研究所國學門」，想來就是父親常提的「北大文科研究院／所」。父親說房子坐北朝南，共有幾大進，相當考究。^⑩ 語音樂律實驗室較靠裡面，其中右面一間是父親工作的地方，左面一間放儀器設備。周殿福常駐左面那間屋，羅常培來時也在那裡工作。^⑪ 西屋很大，有兩間屋子就是專門存放居延漢簡的，是西北科學考察團委託北大保管的。^⑫

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木簡寄存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主要原因是由於北大和考察團的不少人員交錯兼職，比如父親就同時擔任語音室的助教和考察團的幹事。後來，父親把他在北大語音室的得力助手周殿福，也推薦到了考察團兼職。^⑬

北大和考察團不太分家，最初起於劉半農，因為他在兩個機構都是說了算的。劉半農去世之後，考察團的具體事務，由另一位常務理事徐森玉接管，這個傳統仍然延續。徐森玉那時任職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和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但他從前也擔

^⑧ 查一九八五年父親口述記錄，筆錄者用的是「宋」字。父親講述時，我們一般不太打斷他。但有時我們也會當場或者事後請教父親，包括核證某些字詞的寫法；父親有時也會審閱文字稿，作些糾正。這一部分記錄稿上沒有父親修改的痕跡。瀏覽參考文獻，用「嵩公府」或「松公府」的都有。經邢義田先生提醒傅振倫先生回憶用「松公府」後，我想起任繼愈先生（一九三四年考入北大）回憶也用「松」字。又查北京市東城區圖書館網站，松公府原為傅恆齋孫松椿的房產（http://www.bjdclib.com/subdb/laneculture/historybuilding/200906/t20090612_2098.html，2015年3月24日造訪），別稱傅恆宅、松椿府（http://www.bjdclib.com/subdb/laneculture/historybuilding/200906/t20090615_2138.html，2015年3月24日造訪）。由此看來，「松公府」之稱似有淵源可循。又見張德芳，〈烽火中的居延漢簡〉（《人民日報》，2015.9.17，第24版）用「崧公府」。我覺得「崧」字可以連接「嵩」與「松」。但在見到考證依據前，本文根據北大檔案館李向群的學術論文（見注^⑨）和北大圖書館網站（<http://www.lib.pku.edu.cn/portal/bggk/guanshefengmao/guanshebianqian3>，2015年2月9日造訪），暫取「嵩公府」。

^⑨ 李向群，〈老北大校園變遷回顧〉，《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S1：70-73。可是，文中有一張一九三三年的〈國立北京大學附近一帶地圖〉（頁64），上面有「松公府」幾字。作者是北大檔案館的，知道有稱「松公府」的，但行文和關鍵詞（頁63）仍選擇「嵩」字，當有理由。

^⑩ 我未及問明，父親說的是整個嵩公府有幾大進房舍，歸文科研究所與其他部門（比如北大圖書館）共同使用，還是文科研究院就擁有「幾大進」。

^⑪ 周殿福（1900-199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研究員。

^⑫ 「西屋」與語音樂律實驗室辦公室的關係也待考。聽起來像是在同一進房舍內，這也是我一開始的假定，因此未跟父親討論。

^⑬ 關於周殿福何時去西北科學考察團兼職的初步討論，見拙文〈難忘的影子：金克木與沈仲章（一）——〈忘了的名人〉中的非名人沈仲章〉。

任過北大圖書館館長。¹⁴考察團的理事都是兼職的，比如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父親是具體做事的，徐森玉是他的直接領導，最為接近。但父親對徐、胡、傅都執弟子禮，幾位師長也都很器重他。

木簡放在嵩公府，確是爲了方便工作。木簡移到北大研究所之前，一捲一捲包起來，裝在箱子裡，每次取出放回比較費事。後來成立了一個小團隊，四位年輕學者（勞榦、向達、賀昌群和余遜）同時協助馬衡研究，簡化存取手續，提高了效率。西屋地方寬敞多了，又搬進了幾個大櫃子，木簡就按坑位序號，攤放在一格一格抽屜裡。哪位要研究時，就把抽屜整個取出，逐根細看。

據邢義田一九九五年文，木簡「搬家」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以後，「胡、傅爲了攝影和研究的方便，於是和北平圖書館協商，陸續將簡牘移至北京大學文史研究院，並增加整理和釋讀的人手」。¹⁵木簡移居北大是爲了方便研究，這點和父親說的一致，下一小分節還會談及如何方便攝影。但對於「搬家」的確切時間和過程，我覺得還能進一步探討。漢語時態缺少語法形式的標誌，事件發生先後往往依靠語境的理解，最好能將文獻與父親口述對照起來分析。我思忖著，如果遷移發生或策劃於一九三三年，也就是說劉半農在世之日，劉半農應當是位關鍵人物。

在結束本小分節前，說說幾個相關場所。父親提到這些地名時，顯然腦子裡有一幅清晰的歷史地圖。我知道父親在八〇年代上半葉，親自去北京尋找過自己的「足跡」。可惜我對北京歷史地理不熟悉，當時又沒有伴隨父親。依我的理想，最好是先找出錄音帶，把所有相關信息都重新聽一遍，再核對筆錄，弄清父親是在什麼語境，怎麼提到某個地點的，然後對照北京歷史地理的文獻，能找到熟悉這些地方的人，帶我去實地考察一下當然更好。可惜就目前條件看來，這個計劃對我不現實。這兒只能先提供一些信息和推測，希求得到指引。

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北平辦公地址，父親說得很明確，在沙灘八號，紅樓的斜對面。父親接著提到，北池子和沙灘中間有個小胡同，那兒有北大生物系的實驗花園，裡面有五六間房子。由劉半農做主，撥給了西北考察團，用作倉庫，存放中國團員的一些採集品，有的房間也當作工作室。

考察團的北平辦公地址，和小胡同裡考察團的倉庫兼工作室，是同一地點還是兩個地點，我不完全確定。我知道父親當時就住在西北科學考察團，看守考察團的「寶貝」。那些「寶貝」並不是寄存在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漢簡，而是其它物品。父親給

¹⁴ 徐森玉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大約還是在李大釗之前。

¹⁵ 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22。

我講過幾件發生在花園裡的故事，推想父親住在北池子和沙灘中間的那個小胡同裡。佐證這個推測的還有，父親回憶中的另幾處，提過他曾住在沙灘八號，也提到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東西存放在沙灘八號。

在還來不及系統地梳理父親相關敘述之前，我暫且假定，西北科學考察團借用了北大的兩處房舍：第一處是沙灘八號，有五六間屋子，帶有花園。雖然北大是「地主」，但這處房舍是考察團的「家」。考察團在「自己的家」裡分設了工作室、儲藏室和住房。父親在考察團兼職，為考察團理事會處理具體事務，並長駐「看家」，有一間單人臥室。有幾位工友也住在那兒，歸沈仲章指揮。¹⁶

第二處在嵩公府，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府邸」內佔有一角，因房舍寬敞有餘，撥出西屋的兩間，專門用於存放居延漢簡。那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營地」，木簡只是「寄養」在那兒。父親的本職是北大研究所語音所助教，在嵩公府有間單人辦公室，拍攝木簡也很方便。

這兒分享一張父親的老照片，是他早年送給好友李蟾桂的（見篇首附圖）。八〇年代中期，李蟾桂又轉送給了我。對比同批轉送的其他照片，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應當是三〇年代中期，地點是父親在北平的住所或工作場所。如果是工作場所，那就是嵩公府北大文科研究所，也就是居延漢簡存放處。因為沒有把握，先將照片刊登於此，希望知識豐富的人士辨認指點。¹⁷

（二）在北平時期的攝製工作

據《居延漢簡甲編》〈編輯後記〉，該書資料「其來源有三：（一）考古研究所所藏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北京所攝玻璃版 143 版；（二）商務印書館殘存的反體相片 790 餘條；（三）經裘元善〔裘善元〕手流散出的居延所有漢簡。」¹⁸ 第三項「經裘元善〔裘善元〕手流散出的居延所有漢簡」，我不清楚。第二項「商務印書館殘存的反體相片 790 餘條」，無疑就是父親抗戰時期在香港所攝，待寫到香港部分再討論。下面，僅對第一項「考古研究所所藏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北京所攝玻璃版 143 版」，補充一些父親關於在北平拍攝木簡的回憶。

¹⁶ 另有一位國外留學歸來的原考察團成員，留學回國後，在找到工作前，也短期住過那兒。

¹⁷ 北京市東城區圖書館網站有張照片，是嵩公府或松公府內的子民堂，可作參考：

http://www.bjdclib.com/dclibpic/dhly/building/200907/t20090709_6995.html（2015年3月24日造訪）。輾轉求得附近居民對比篇首照片，問有否可能也是嵩公府，答曰「推測可能是。」又說北大改建該院，到五〇年代末，平房僅存子民堂。

¹⁸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139。

在劉半農生前，居延漢簡的拍攝工作已經開始。北大文科研究所有個專管照相的師傅；沈仲章在語音室工作，又懂攝影；而且劉半農本人也愛好攝影，在翻拍文獻資料方面還有過一個「發明」。¹⁹這幾點都支持了邢義田所言，把木簡從北平圖書館移到文科研究所，除了研究的方便，也是爲了攝影的方便。

我記不清父親是否說過，當時的攝影工作是由劉半農單獨領導，還是胡適、傅斯年共同促進。父親只說，「他們」（父親用第三人稱，他本人不在內）先挑比較清楚完整的木簡拍攝，拍了大約四十多張照片，其中包括那七十多根連在一塊的卷冊。

父親接手這項工作時，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拍攝零碎的、破損的、字跡看不太清的木簡。父親進北大前在唐山大學讀的是工科，進了北大又遍跨文、理、法（商）三院，還有個什麼東西「碰碰就會」的小名聲。凡有難辦的事，常常會被召去嘗試摸索。父親試了各種黃色和紅色的濾色鏡，用以加強反差，濾去木紋上燒焦的顏色，……。不過，有的照片因此而偏黑了，本來不黑的也變黑了。後來發現，用紅外線照相效果很好，比肉眼可以多看見一些字。可是紅外線底片等材料很不容易弄到，價錢也高。

對於北平木簡攝影工作的進展以及何時停頓，父親沒有接著往下說。我估計，那個階段還屬於實驗，等找到了較好的方法，即紅外線拍攝技術後，又得待料。加上劉半農突然去世等原因，這一項目就擱置下來了。我還猜測，居延漢簡到了香港之後，爲什麼傅斯年和徐森玉不肯放沈仲章走，指定要他負責拍攝，也許就是因爲父親在搶救木簡前已經有了攝影經驗。至於決定採用紅外線技術，很可能是聽說了父親在北平的經驗。

至於在北平時究竟拍攝了多少根木簡，尙待查核。在此僅僅提出值得注意的兩小點：第一，《居延漢簡甲編》〈編輯後記〉中的計量，有時用「版」，有時用「簡」或「條」。如此區分肯定自有道理，可對我這樣的外行，一下子算不太清。上文所引「（1）考古研究所所藏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北京所攝玻璃版 143 版」中的量詞是「版」而不是「根／條」或「簡」，所以我說「尙待查核」拍攝了多少「根」木簡。上文又提到，父親接手木簡攝影前，已經有人拍了四十多張照片，其中包括連在一塊、共有七十多根的卷冊。「張」是口語中照片的量詞，「版」（plate）當是從製版印刷角度來說。一「張」或一「版」，可以含有不止一「根／條」木簡。

第二，《居延漢簡甲編》〈編輯後記〉中在「關於第一項」後有段補充說明：「另外，沈仲章寄來當日在香港所制珂羅版，其中有八十六簡不見於所藏玻璃板。今

¹⁹ 父親簡單地提了這個「發明」，我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留待以後敘述。

一併補入。」²⁰這「一併補入」的「八十六簡」，到底是「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北京」曾經拍攝過玻璃版、有記錄卻「不見於所藏」呢，還是沈仲章「在香港所制珂羅版」、從來就「不見於所藏」？我沒有讀明白。如果考古研究所的記錄保存得好，查明這一點應該不是件難事。我在以後的續篇中，打算對商務印書館木簡書稿的「劫後餘灰」略加探討，屆時再議這個問題。

此外，「沈仲章寄來當日在香港所制珂羅版」，包括這八十六簡，很可能正是勞榘編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所缺。其間的來龍去脈，涉及到一九四一年父親離開香港去上海試印樣張之事。但是，在未得史語所的專家指導前，討論為時還過早。

二、居延漢簡「逃難」之初

這兒先「插敘」一件事：早在一九三四或三五年，北方感到日軍的威脅，人心波動。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圖書館，開始把一些善本圖書，陸續往南京上海疏散。胡適也曾考慮，是否該把居延漢簡轉移到南方。有一次，胡適要沈仲章把木簡裝在兩個箱子裡，送到火車站，由他親自帶往南方。後來時局平穩些了，胡適又把木簡帶回，也是父親去火車站接他。²¹這次裝箱的「演習」，也許有助於父親後來「偷」運居延漢簡時，不慌不忙，「胸有成竹」。

（一）日軍進駐北平的那幾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戰爭氣氛瀰漫，不少人趕緊離開北平。西北科學考察團也討論了物品在戰時的轉移和保存，原沙灘八號的不少東西，比方說袁復禮等人蒐集的標本，都裝了箱子。居延漢簡其實比這些標本更珍貴，但一是因為裝箱的標本都是袁復禮他們自己採集的，感情上牽掛更多些；二是因為木簡寄存在北大研究所，緊急時誰負有保護責任不太明確。裝箱的標本大都被轉移到了北平協和醫院，就是存放北京人頭骨的地方。大家以為協和醫院最保險，不料北京人頭骨從此失蹤。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那批物品最終命運如何，應當早有記錄報導。²²也因為本文屬於急就章，來不及查找文獻，望博識者告知。

²⁰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頁139。

²¹ 我讀到過一篇文章，胡適曾帶木簡去上海舉辦展覽，但展出的只是部分木簡。居延漢簡在一九三七年以前，離開北平是一次還是兩次，以及相關事宜，是可以查一查的。

²² 父親和袁復禮等後來有過往來，曾聽說那批物品大都下落不明。

如前所述，大家知道居延漢簡比沙灘八號的其他東西都重要，但因為木簡放在嵩公府，考察團的人認為，安全問題變成了北大的責任；可是北大方面卻不一定清楚，沒有討論如何裝箱轉移。七月已是暑假，胡適又在南方，文學院沒有負責人，處於無政府狀態。

以往每年放暑假，父親在六月底就出發去外地旅行考察。一九三六年夏天，父親已和女友約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碰頭，一起出遊。如果父親在七月七日之前離開北平，誰會來搶救居延漢簡就不得而知了。也巧了，那年父親受羅常培之托，翻譯馬伯樂的《唐代長安方言考》，接近七月還沒完工，他就寫信推遲旅行，與女友相約八月一日在鄭州見面。²⁸

七七事變爆發，時局緊張，又值暑假，許多南方人都離開了北平。一批接著一批，父親送走了很多人，自己倒沒有急著走。眼見北平已被包圍，人人都明白戰事是明擺著的了。七月二十八號下午，父親去火車站送別了最後幾位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位好友林津秀就是去當義務護士，救護從綏遠運送到保定的抗戰傷員。北平火車站在西直門外，友人走後，父親傍晚五六點鐘回到西直門，城門已經關閉。父親和很多人蹲在地上，等在城外。聽到遠遠的隆隆炮響，眾人都說日本人開始正式進攻北平，一片慌張。還好，城門不久便打開了，父親隨著人群一擁而入。原來，關閉城門是為了防止郊外的難民衝進城。守門的觀察之後，覺得等在門口都像是城裡居民，就趕快開門放他們回家。

第二天，報紙都宣稱全面抗戰開始了。一時士氣民氣極為高漲，抗日保國，匹夫有責。若有傷兵送來，老百姓會自發慰問。只聽得天上日本飛機嗡嗡盤旋，街上快報號外連連報捷。父親年輕，意識到非常時期來了，並不害怕，反倒有點兒興奮，期待著目擊戰爭。他覺得北平會成為第二個馬德里，發生浴血奮戰，甚至被夷為平地。

每當飛機來了，別人東躲西藏，父親卻跑出去觀看。他也沒有想到快「逃」，還以為宋哲元的部隊一定能抵抗一陣的。誰知道隔了一天，七月三十日早上醒來，槍炮聲停了。走到街上，站崗的士兵無影無蹤，四下鴉雀無聲。老百姓都非常納悶，戰爭氣氛哪去了呢？不久大家就聽說了，中國軍隊已經潰退，北平成了一座空城死城。城裡很多支持護城將士與日軍拚搏的民衆，從極度激昂轉為極度悲憤，不知怎麼辦才好。

²⁸ 至少從一九三六年起，父親已經開始翻譯《唐代長安方言考》（參見沈仲章譯，〈漢音源流考（一）〉，《天津益世報》，1936.8.13，第12版）。父親還遵胡適之囑，翻譯一本天文學讀物，也到一九三七年暑期才完成，後者列入商務印書館出版計劃，留待香港部分再敘。那段時期父親有不少翻譯工作，加在一起使他難以完稿，因此推延行期。父親還提及翻譯關於八思巴文的文章和斯文·赫定的 *Riddles of Gobi Dessert* 等等，曾在報刊上陸續發表了部分。我欲查尋核證，如蒙博覽專攻者指點幫助，理當感激。

日本大部隊並沒有馬上開進北平，大概正在和親日派的紳士們談條件，怎麼和平進城、維持治安等等。但少數先遣部隊已進入城，佔領了電台、機關等要害部門，其中包括北京大學。

上文說父親原與他的女友約好，八月一日在鄭州相會，所以本來計劃就在七月三十日那天離開北平。可是，火車不通了，父親走不了，只能給女友發電報，再次推遲行期。

北平城裡是一片沉靜寂寞，大家都不說話，也不悲傷，不知命運如何，等待悲劇發生。這時，父親想起了居延漢簡。居延漢簡的保管和轉移本來並不是父親的任務。父親請示了幾位北大負責人和學界頭面人物，沒人發話。

(二)「偷」出北大研究所

父親聽人說，日本軍隊半夜闖進了嵩公府，存放木簡的西屋對面的屋子，已經被撬開了。那屋裡藏有藝風堂碑帖拓片，日本大兵撕了書頁紙卷，用作引火紙、手紙什麼的。父親悄悄前去偵察，發現先頭部隊的確很不文明，那一帶弄得又髒又臭。走近房子，似乎也聽到了撕紙的聲音，心便揪了起來。他想到不少木簡都攤開放著，要是日本人進了屋，凶多吉少。被稱為「二十世紀東方考古四大發現」之一的居延漢簡，即便沒有被先頭部隊裡的無知大兵毀壞，也會被後繼部隊中的文化特務掠走。留在北大研究所，難逃一劫。

父親於是決定挺身而出。他說，搶救漢簡主要是出於對幾位師長，尤其是對劉半農和徐森玉的知遇之恩。加上對斯文·赫定的崇敬，因為斯文·赫定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中國後，兩年內來信常提到木簡，父親看過這些宗卷。當初將木簡留在中國的談判，父親以翻譯的身份也參與了，這時真有點後悔，還不如讓斯文·赫定他們帶走呢。

因為別人都跑了，父親成了北大研究所留守人員的小小「首領」，周殿福和一些北大工友，一切都聽沈仲章。父親在北大已經待了十一年，周殿福和工友們大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地形很熟。他們摸了情況後，選擇白天行動。

有些文章說父親是晚上「爬牆」進屋去的。父親確實夜間去偵查過，但在一九八五年，他特意解釋，當時夜裡有人巡邏，如果他們天黑以後，拿著大包大箱子，在平日不住人的北大研究機構附近晃悠，反而惹人注意。所以，他和周殿福，帶著一位工友，白天從後門「走」進了嵩公府。

父親和周殿福兩人進了西屋，把木簡用脫脂棉花包好捲起來，裝進了兩個普通旅行包。上文提到，胡適曾經考慮把木簡運往南方，父親替他用兩個箱子裝過木簡。所以父親心中有底，雖說木簡有萬枚以上，是可以裝進兩個旅行包的。與木簡同時「偷」出的，還有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重要宗卷和物品。工友等在窗外望風，從窗口接箱包，並不清楚「偷」的是什麼，當然明白肯定是不能讓日本人拿走的寶物。

父親和周殿福帶著木簡「逃」出了北大，工友又在前面「探路」，引導他們避開兵警巡邏。那時北平街上拿著旅行包搬家或者逃難的人很多，大大方方地趕路，人們也不會覺得奇怪。就這樣，父親他們把木簡轉移到了北長街。北長街有個小廟，是徐森玉的住所。徐森玉不在北平，但父親與徐森玉相交甚厚，可以隨意進出徐家，存取物品。

(三) 存入德華銀行

父親擔心日本人的「雷達」不會放過北大，因而把居延漢簡移出研究所，存放於民間小廟，但這只不過是急中生智的權宜之計。他進一步推測，日本人很可能會搜查大街小巷，徐森玉家並非久留之地。同時，父親心裡也惦記著女友，希望把木簡安置得更穩妥一些，他可去履行約定。

父親想到了東交民巷的德華銀行。德華銀行是德國人的產業，德國是日本盟國，日本人不會去騷擾。但是，中國人到德國人的銀行去寄存東西，也不見得容易。好在父親和德華銀行打過交道，已經建立了信譽。

話得轉到十來年前，在二〇年代下半葉，父親剛到北大的頭幾年，他曾跟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學習梵文。鋼和泰又把沈仲章推薦給德國學者當助手，協助翻譯禪宗六祖《壇經》。²⁴

作為工作酬勞，父親每次或每週會收到一張支票，他就得到德華銀行兌換，因此開設了一個戶頭。去的次數多了，跟銀行裡的職員也熟了。他們見老客戶來了，很好說話。父親說，那兩個箱包是他私人物品，北平戰亂，他要離開一陣，需要租個保險箱。²⁵ 這話聽起來合情合理，銀行辦事人員就開了綠燈，手續相當簡便。

²⁴ 大概是魯雅文（Erwin Rousselle），他翻譯了禪宗六祖《壇經》。其孫 Ardo Rousselle 博士說，他祖父在一封信中稱沈仲章為「個人助理」（personal officer）和「可信賴的佛音信使」（trustworthy buddhistic adlatus）。

²⁵ 對包裝木簡所用的容器，筆錄中有時用「箱」，有時用「包」，大概是父親口述用詞。我推測父親搶救木簡的最初階段，還來不及定做木箱子，用的是旅行包。

木簡「潛」出嵩公府，暫居北長街，鎖進德華銀行，前後一共不到兩週。做到這一步，父親稍稍舒了一口氣。他原以為，在情急之時無人過問木簡，他「越權」行事，盡心盡力了。此刻他要做的，就是趕快逃出北平，找到徐森玉，把德華銀行的寄存憑證交給他。北大和德華銀行沒有關係，日本人一時不會想到國寶藏在那裡。徐森玉和考察團理事會就可以有時間討論，往下該怎麼辦。於是，父親就去了天津。

(四) 日本人的追問

父親去天津和在天津的經歷，〈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已有介紹，我的補充將在另文專節敘述。這兒先說幾件日本人在北平追查的事。

第一個消息來自天津的瑞典領事。父親到了天津後，為求多一重保險，曾去找過瑞典駐天津領事館。居延漢簡是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率領的考察團發現發掘的，眾所周知，考察團的全稱就是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上文提到，斯文·赫定一直關心這批木簡，父親看過斯文·赫定來信等等。一九三五年斯文·赫定離開中國時，父親參與了商談及登錄借用標本的全過程。斯文·赫定借走那批物品時答應，數年後原璧奉還。父親想，與其木簡給日本人搶去或毀壞，還不如交給瑞典人。瑞典學者一定珍視木簡，加以研究，將來也會歸還中國。

瑞典是中立國，父親去見的領事叫 Long。父親並沒有把居延漢簡之事和盤托出，但領事對這一問題倒很熟悉。瑞典領事說，前幾天剛收到北京公使館的備忘錄，說有日本軍事人員去了那裡，索討中瑞西北考察團到新疆、蒙古考察的地圖。瑞典領事很清楚，漢代木簡是不能落在日本人手裡的，一口答應幫忙。他告訴沈仲章，必要時允許他動用瑞典方面的名義，阻止日本人搶走木簡。同時馬上通知瑞典使館，他們會出面交涉。

第二個消息是周殿福傳到天津的。父親八月中旬抵津，但因種種且待另文分解的原因，在津滯留了幾個月。在這期間，周殿福到過天津，告訴沈仲章，日本人去了西北考察團辦公室兩次，搜查、打人、追問負責人的下落。父親留在那兒的東西，都被翻了個遍。還好，父親離開北平前，想起有幾封從延安來的信，可能會惹出麻煩。²⁶於是他對紙片等匆匆作了清理，因此日本人一無所獲。

²⁶ 父親的好友吳光偉一九三七年在延安，給他寫過好幾封信。

最後一件根據的是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的回憶。鄧先生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中，有一段關於居延漢簡的文字。²⁷ 摘引部分如下：

……1930年，由中外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與內蒙接境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海發現了萬餘枚漢代簡牘，運北平後歸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勞榘、余遜、沈仲章負責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後，沈仲章冒生命危險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後又歷經艱險移至天津，急急電告在長沙的傅斯年先生。……就在沈仲章把這批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之後，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日本人向他追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詢，我答以：“一無所知。”可見，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機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的最後幾句，那是鄧廣銘先生的親歷。鄧先生說：「就在沈仲章把這批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之後」，日本人向周作人「追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又向他查詢。鄧先生感嘆，如果居延漢簡沒有及時轉移，「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以上所述不過是木簡逃難的第一步。本文開頭預告「寫到哪兒就哪兒」，時間和字數都提醒我，就此打住，日後再續。

後記：感謝徐維源和喬紅記錄口述，陳體仁和謝麗淑查找資料，徐文堪和金木嬰提供信息，石汝傑和夏劍欽審閱初稿。

²⁷ 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臺大歷史學報》20（1996）：5-6。